**《燕丹子》**

**内容梗概**：《燕丹子》这个故事的主题为“复仇和报恩”，前者是燕丹子对秦嬴政的报仇，后者是刺客荆轲对于燕丹子的报答。

《燕丹子》这个故事分为三卷，《卷上》讲的是燕丹子受到的秦嬴政的“遇之无礼”，激发起了燕丹子复仇的决心，回去以后“奉养勇士，无所不至”。《卷上》大篇幅是燕丹子与其老师鞠武的往来，在最后，鞠武向燕丹子提议，让他去找一个叫田光的人；《卷中》主要讲的是燕丹子与田光交谈，田光为了燕丹子和鞠武一起去请荆轲；《卷下》可谓是《燕丹子》这个故事的高潮，也就是“荆轲刺秦王”。

**探究问题**：《燕丹子》是史传还是小说？/比较《燕丹子》与《史记》的异同》？

《燕丹子》沿袭了《荆轲传》的基本故事框架，在人物、情节、题旨等方面大异其趣。其所增添的变动并非来自民间传闻，而是江淹依据与现实处境所做的想象之语。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燕丹子》有别于杂文杂传的小说文体性质，是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即将趋于成熟的标志和衔接由史传到小说的重要环节。

1. 虚构艺术的叙事手法和独特的叙事视角
2. 虚构艺术

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以“作意好奇”来肯定小说中的虚构艺术。《燕丹子》不同于《史记》的地方, 在于《燕丹子》中有“乌白头﹑马生角﹑机桥不发”, “ 进金投龟﹑脍千里马肝﹑戴美人手”等虚构的故事，可见其成书并不是为了名属古史之列。史家以“实录”为根本精神, 虽然其间也有传说的虚妄之事, 但因作者相信事实如此, 或无可考证, 也就作为史传的一部分堂皇的存在；这种态度正同于六朝志怪小说的创作, 所以《搜神记》的作者干宝被誉为“鬼之董狐”。而小说家的创作是根据个人意愿选择的，“虚”“实”的安排全服从于自己创作的需要, 在史实的基础上加上“艺术虚构”, 就会使情节更加曲折, 富有传奇性, 也就更能吸引读者。

1. 叙述视角

史家一般采取全知性的历史叙事, 即叙事者尽可能地将全面的场景和人物关系展现给读者, 力求公正地把握历史, 如《史记·刺客列传》中, 作者把荆轲放入历史的背景中去介绍, 不仅介绍荆轲这方面的情况, 也对秦王有所交代, 暗示人物的悲剧命运; 且在叙述中可以穿插议论, 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史家观点。但小说家创作多采用第一或第三人称限制叙事, 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视角, 即文本的叙事视角的大小以人物所知范围来确定。《燕丹子》的作者即是如此, 始终站在燕国的立场上叙事, 所知限于燕太子一方, 并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 叙述故事也仅限于燕太子丹复仇这一个故事, 并没有像《战国策·燕策》那样记叙整个国家的历史命运, 所以从“艺术虚构”和叙事角度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作者创作《燕丹子》的意图, 不是以史家的观点来叙述重现历史故事, 而是用主观的意愿来讲故事, 即有意去进行小说创作。

1. 故事情节的安排

（一）情节叙事的一波三折

故事情节是小说的基本要素之一, 《燕丹子》一书同《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一样, 在故事情节的叙事安排上以历史传记为参照系, 或直接运用历史叙事的方法，称其为“杂传”, 说明了《燕丹子》与史传的传承关系, 又定性为“小说”, 说明了《燕丹子》在史传基础上跨越性的发展, 已经具备小说叙事的特性。荆轲为燕丹子报仇的情节。先是荆轲计划以“樊於期首﹑督亢地图”骗取秦王信任, 再成大事, 可因为太子丹“心不忍”推迟下来;太子丹却又性急, “欲先遣秦武阳”, 令荆轲“怒”, 以至于“潜见樊於期”共谋大事, 令其“自刭”;事情似乎又回到了计划的轨道上来, 继续发展, 应该是大有希望, 却又穿插“易水送别”一节, 遍染悲凉气氛; 入秦后, 起初很是顺利, 可秦武阳竟然“大恐, 两足不能相过, 面如死灰”, 差点使事情败露, 幸而荆轲掩饰过去, 取得献图机会;“图穷匕首见”, 荆轲已经“左手把秦王袖, 右手揕其胸”, 事情势在必得, 可是秦王“乞听琴声而死”, 由琴声授意而逃, 荆轲只得到“断两手”, “箕踞而骂”的结局, 真是出乎意料, 让人掩卷唏嘘不已!

由此可见, 《燕丹子》故事情节的安排早已经注意到了矛盾的对立和统一, 对于“刺秦”的故事不是满足于历史性的平铺直叙，而是提出矛盾的主要方面, 逐层设疑, 又逐层展开, 环环相扣, 引人入胜。这种严谨的情节安排, 是后来许多小说包括唐传奇在内都无法比拟的, 着实让人惊叹。

（二）叙事安排的细节

“黄金投蛙”﹑“杀马进肝”﹑“玉盘盛手”等例子来说明“小说就是通过太子丹对人世间最珍贵的黄金﹑美人﹑名马的态度, 自然而然地回答了太子丹对荆轲的看法﹑价值﹑希望和寄托”。这是从小说的角度对《燕丹子》的细节描写进行肯定和审美;但有人用史家的眼光来看待这三件事, 认为太过血腥, 损害了英雄荆轲的形象, 则是愚夫之见。

（三）伏笔和铺垫

如开头部分说“燕太子丹质于秦, 秦王遇之无礼, 不得意”, 才使得太子丹“深怨于秦”, “欲复之”, 所以“奉养勇士, 无所不至”, 这就为以后“黄金投蛙”﹑“杀马进肝”﹑“玉盘盛手”等超出常人的举动提供了依据, 因为太子丹志在复仇, 为此可以不惜任何代价, 所以后文均有合理性。还有荆轲潜见樊於期一节, 荆轲答应樊於期“左手把其袖, 右手揕其胸, 数以负燕之罪, 责以将军之讐”, 后来刺秦王时无一例外做到了, 所以“刺秦”虽然失败却没有失信于樊於期, 可见作者是有意安排如此。因此, 在情节的安排上可以说《燕丹子》的作者已经具备了娴熟的小说叙事技巧。

**《世说新语》**

**探究问题**：从《世说新语》中看魏晋风度是如何的？

1. 越礼重情

儒家历来尤重丧礼。孔子将生与死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曾言：“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礼 记》还规定行居丧之礼的种种哀痛行状，如“君子之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等，极 其恭敬考究。 与儒家君子不同，魏晋士人面对礼与情的冲突时，常注重真情表达，力图摆脱礼制之束缚，《世说新语》可窥 一二。如阮籍曾高调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居母丧时，他出席宴会，饮酒食肉，丝毫不囿礼制，甚至母亲出 殡当日，他还烝豚煮酒，未表现出半分哀痛。直至真正下葬诀别之时，阮籍才哀号一声，吐血晕厥，其身体也“废顿 良久”。足见阮籍虽表面弃礼制于不顾，其内心依然严秉孝道，只不过冲破了烦琐礼仪的束缚。何曾对此微词颇 多，称阮籍当被流放海外。然阮步兵丝毫不为所动，反而“饮啖不辍，神色自若”。裴楷乃至司马昭都对其袒护有 加。晋文王言：“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 司马昭理应是礼教的维护者，然而他却认为阮籍因疾病缠身而 饮酒食肉同样合乎丧礼。裴楷更是盛赞阮籍乃“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i。 又如颇有孝名的王戎与和峤同时遭大丧，王戎凄入肝脾，哀毁骨立，但日常饮酒下棋，享乐不辍；和峤却与 之相反，虽悲戚难当，涕泗横流，且诸礼皆备，甚至“量米而食”，然神气却半分未损。时人对王戎给予更多 肯定，乃至晋武帝都因此对其评价甚高。这昭示了流于表面、烦琐冗杂的礼制发展到此时已然引起了士人阶层 的反思。他们注重真情表达，反对僵化之礼，与春秋儒者一丝不苟地履行各项礼仪有明显差距。

1. 任诞恣肆

君子人格以“仁”为核心，实现“仁”必须保持自律。其自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克己。如孔子时常 以“求己”自守，力图通过自我约束来完善个体品质，最终实现仁的终极追求。另一方面慎独。慎独向来圣人 先贤追求的修身境界。《大学》载：“君子必慎其独也。”以此勉励世人，独处之时也要格外戒慎自守，防微杜渐， 内心有所坚持，不能随意行事。《诗经》之中也多处蕴含慎独之德，如“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然而魏晋士人却任诞恣肆，随性自由，常放浪形骸，与谨小慎微、克己慎独的君子人格有着霄壤之别，这也使其成为中国士人发展史上最特别的存在。他们嗜酒如命，裸裎成风，放纵之行惊世骇俗。《世说新语》中有因 饮酒无度而卧病在床，却仍要以酒解渴的“醉侯”刘伶；有一生不乐仕宦，却甘愿为美酒屈身官场的阮籍；更有 常以大瓮盛酒豪饮，尽兴时还与群猪共饮的阮咸。 魏晋士人的“任诞”还表现在裸裎成风：刘伶常“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自称“以天地为栋宇， 屋室为裈衣”。阮籍更是“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晋书》还曾载：“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 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可见以上所列之行于魏晋时人而言已经极为普遍，这无疑是对名教的猛 烈冲击，与春秋儒者的克己慎独不可同日而语。

三、饮酒文化盛行

自春秋伊始，君子就对饮酒之行极为考究。周代有专门的酒礼文化，周公更是因殷商灭亡的前车之鉴而颁布 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禁酒令——《酒诰》。而魏晋时期，文人盛行饮酒文化。

这些行为看似荒诞，实则与其遭遇密不可分。他 们身处风谲云诡的动荡时代，虽常怀济世之志，然而 变故频发，天下名士少有全身而退者。为了躲避杀身 之祸，排解内心苦闷，他们只能通过醉酒来宣泄心中 郁结，以达到物我两忘的境地，可谓“胸中磊块，须酒 浇之”。同时他们追求自然纯粹，不加雕饰，衣物于 他们而言都是多余的。魏晋士人这些举止表面荒诞 乖谬，实则暗含了他们不囿名教礼法，率性放达，返 璞归真的价值选择。

1. 归隐山林

魏晋以降，政局扰攘，大量名士无辜卷入党争， 动辄招致杀身之祸。加之玄学兴盛，隐文化成为社会风尚，“七贤”的林下之游风靡一时。魏晋士人为了全身远害，纷纷选择远离庙堂，终老林泉。不同于前代士人兼济天下的现实关怀，他们一改汲汲求仕的执 着，遁世隐逸之风盛极一时，《世说新语·栖逸》一门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隐士的生活细节。 如阮籍曾慕名远赴苏门山中与得道真人孙登切 磋。他“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 又“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 然孙登对此毫 无回应。阮籍见状，吹着口哨悻悻下山。刚抵达半山 腰时，忽然听到山顶百乐齐鸣，如数部乐器合奏，响 彻林谷。阮籍回首一望，原来是那孙登在吹口哨。满 腹经纶、才高八斗，还精通乐理的阮步兵在孙登面前 都黯然失色，足见其超凡脱俗之境界。他在虎斑霞绮、 林籁泉韵的自然界隐逸终生，对三皇五帝之义、夏商 周三代之德闭口不提，更不屑在儒道两家进退两难， 只用纯粹的啸声便可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这正是 魏晋士人所孜孜追慕的隐逸之最高境界。

《世说新语》中极具代表性的隐士还有亦仕亦隐的山涛。他年逾七十，仍能游于朝堂；他隐逸林下， 依然肆意酣畅；他深谋远虑，能极早觉察危险，果断 归隐，不交世务。他气度不凡，与竹林中人终日酣畅 淋漓地举杯共饮；他不仅在朝实现了政治理想，还享 受了山水之乐。他既有儒家“兼济天下”的政治热忱， 又有道家逍遥隐逸的生活情趣。“隐居以求其志，行 义以达其道”的传言在他身上变成现实，他也真正 将“兼济天下”与“隐逸林中”通融无碍。 此外，潇洒辞官的名士张翰也令笔者甚为叹服。 在张翰看来，功名利禄甚至比不上一杯及时酒。他深 知功名乃身后之事，唯有及时行乐才是首务。因此当 他在洛阳见秋风起时，便突然思念起家乡美食菰菜 羹、鲈鱼脍。他言：“人生贵得适意尔，何羁宦数千里 以要名爵！”随即便辞官归乡，隐居半生，再未出 仕。张翰此时已经贵为大司马东曹掾，然而却甘愿放 弃来之不易的高官要爵，如此旷达自得、激流勇退的 人生态度使其成为千古美谈。